卷 首 语

乐黛云

全球文化多元接触已不可避免，其结果是使不同文化像合金那样熔为一体呢，还是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基因，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传统的特点，使数千年形成的多样文化生态得以保存？去年 10 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欧中高层文化论坛，相当深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恩伯特·埃柯认为表面的一体化不过是一种“肤浅的伪全球化”，它遮蔽了更深层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杂交。我们的基本目标应是理解和尊重“在他者的自身文化多样性”中的他者。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应当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教育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多样性的“对视”之上，他坚持这是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在未来要承担的必不可少的任务。本刊主编李比雄在会上提出必须在观察者之间建立一种跨主体的关系，通过相互认知的方法克服原有的隔阂和限制，在一场概念革命中建立起新的批评框架。中国学者黄平博士进一步强调“跨文化”，不只是地理或空间意义上跨越各种阻隔的交流和对话（cross-cultural dialogues），更是对现有文化的超越（trans-cultural），跨越出自己文化的屏障，看到文化的多样性，并从中看到未来的开放性，以及各地区和族群的人们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情境下自己创造历史，共同走向和谐、正义的可能性和正当性。赵汀阳博士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理性”为例，指出“关系理性”优先考虑的是最优的相互关系，是互相伤害的最小化，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并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这也许是规避风险，消弭冲突的最好办法。他坚信任何文化都可以超越自己，为其他文化提供新的思考和可能。他们的主张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认为以上说法也许一时还难于实现，但他们相信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先改变世界观罢，世界终将因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

本期所载方法论的研究与上述有关多元化的讨论一脉相承，黄俊杰教授以东亚文化圈作为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心，倡导“每一个社会与民族之所以值得研究，不仅是因为它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更是因为它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汪德迈教授以“汉字起源于占卜”来说明汉字文化圈的特殊意义。从这种新的方法论出发，西方历史学中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概念都会受到质疑而萌生出新的历史理论体系。作为本期约稿中心的“回忆、怀旧和未来”正是与此遥相呼应。例如在“我们的历史——巴尔特书写的中国”一文中，罗兰·巴尔特就强调“历史文本是一个‘能指’的星云，而不是一个‘所指’的结构”；它调动的代码无止境地显现，不可确定；各种意义系统都有可能控制这个绝对多元的文本，我们可以通过好几个入口进入到其中，但任何一个入口都不能被确认为是主要入口，更不是唯一入口。

本期 以“汉学与汉学主义”为核心 的圆桌笔谈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如汉学究竟是知识还是想象？是 “真理”还是 “神话”？是一个科学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汉学的“汉学主义”性，会不会由于学科缺乏批判意识而造成“自我汉学化”与“学术殖民”等等。预期这些问题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